



美国衰落源于其内部问题,而非国际竞争。主要原因是奖励了不该奖励的人,并且支出比例严重失衡。一些短期问题,如庞大的财政赤字、高失业率、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以及失败的基础教育等等,都是错误激励的表现。除非能够调整其错误激励的体系,否则美国将逐步沦入拉美国家之列。

奖励特权

帝国兴起的原因是奖励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并对未来投资。帝国衰落是因为只奖励特权阶层,并为过去支付庞大的支出。美国现在属于后者。除非其政治体系能够改变现在的激励结构以及消费习惯,否则美国很可能衰落。

几个月前,在有关提高国家债务上限的争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共识,授权在未来十年将预算赤字削减1.2万亿,并成立了一个超级委员会来负责相关细节。

超级委员会未能达成妥协。其后果不会在2012年浮出水面,因为授

予贡献的人,并对未来投资。帝国衰落是因为只奖励特权阶层,并为过去支付庞大的支出。美国现在属于后者。除非其政治体系能够改变现在的激励结构以及消费习惯,否则美国很可能衰落。

几个月前,在有关提高国家债务

谢国忠: 美国走向末日 帝国衰落不可避免

权的削减从2013年开始。明年的大选可能会改变整个政治格局。很可能一党会再次同时主导国会和白宫,这将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因此,超级委员会不用承担自己失败的后果,但却为明年的大选提供了弹药。这是美国政治体制失常的另一个例子。

奖励错误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99% VS 1%”。最顶层1%的人口拥有大约全部1/5的收入和2/5的财富,顶层10%的人口占有超过一半的收入以及80%的财富。80%的人口基本上只拥有很少的财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几乎没有积蓄作为缓冲。这种不平等在过去20年内又几乎翻了一番。

不平等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当然,竞争具有鼓励作用。不平等常常是鼓励人们把蛋糕做大而值得付出的代价。蛋糕做大会使所有人获益,但是不平等也随之加剧。限制竞争提高了平等,但却降低了人们工作的动力。社会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最糟糕的不平等来自限制竞争。这同时破坏了效率和社会和谐。比如菲律宾曾经被少数几个鼓励垄断的家族所统治。在过去20年内,跟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穷。菲律宾人在国外打工,寄钱回国,又延续了国内的低效率。很多拉美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美国的情况也越来越类似。富人大都是企业管理人员、医生、律师、银行家等。他们获得的奖励跟表现无

关,而是取决于他们的位置。企业经理比普通员工的工资要高,但是应该高多少呢?以什么为基础呢?

比如,现在美国大公司CEO们的工资是普通员工工资的343倍,1980年只是42倍。如果CEO们创造了很多价值,也算值这个工资。但是,看看股票市场,股东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表现极为糟糕。如果股东也就是老板表现糟糕,CEO们怎么能够拿千万的报酬呢?薪酬顾问们或许可以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太长时间了。当然,当CEO们拿千万的报酬时,其直接下属就会拿百万的薪资。

管理层薪酬上涨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这种支出并无贡献支撑。

公司治理的崩溃是美国经济问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20世纪初期,大公司蓬勃发展,经理人而不是股东取得了企业控制权,有关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效率的理论应运而生。

但是,因为经理人决定自己的薪酬,大公司最终沦为了经理人的牟利工具,而不是为股东或员工谋福利。董事会本应维护股东利益。但实际上,大多数董事都是CEO的朋友。或许可以这么说,美国经济的失败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破坏资本主义造成的。

高收入但不创造价值

美国医疗费用如此之高,一半是因为医生和医院的收费高于其他国家。美国人口的健康状况表明,费用越高不代表效果就越好。竞争在医疗市场上不起作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了市场竞争分配资源的有效性。患者是弱势群体,必须听医生的话,医疗市场自然具有通胀趋势,因为医生更偏好贵的治疗方法。

患者要是有医疗保险,因而不拒绝高价,那么价格上涨就会相对容易。当然,保费也会上涨,反映成本。这种螺旋式上升是美国医疗支出上涨失控的原因。

在其他发达国家,政府采取限制医生收费和配给服务的措施,控制了医疗费用上涨失控的趋势。有人认为美国在某些方面的服务确实更好,但这种孤立案例不足以证明一个医疗成本是别国两倍,但是人口健康状况却没有更好的体系的合理性。

金融专业人士是另一个不是根据贡献获取收入的例子。金融行业的薪酬已经增加到了其他行业的四倍,金融行业的崩溃,使得所有股东一无所获,需要纳税人救助。这个行业并没有为股东牟利。为什么其从业人员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薪酬呢?

律师是另一群高收入人群。法治需要这种专业人士的维护。但是,美国的问题是律师数量太多了。这种供大于求造成了一系列规避或钻制度空子的服务。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专门打事故官司的律师(ambulance chasers),他们寻找各种机会起诉医院、医生和保险公司。在高端服务领域,律师为企业提供如何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最大化企业经理人利益的服务。对于法治来说比较重要的法律人士,例如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等等,其收入并不高。律师行业是另一个收入很高但不创造价值的例子。

(摘自《财新网》)



林毅夫驳中国崩溃论:
未来20年GDP增速
将持续8%

11月29日,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亚洲经济政策会议。美联储副主席耶伦呼吁亚洲调整经济政策,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对卷土重来的“中国崩溃论”给予了反驳。

耶伦暗示美联储有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空间,并呼吁亚洲经济体调整经济政策,提振内需、扩大投资、升值汇率,以提高全球经济需求,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耶伦说:“那些拥有巨额经常账户顺差和扩大内需能力的国家必须做出表率。”她强调中国、印尼和韩国等国领导人已对此做出承诺。

在欧元濒临崩溃,西方世界面临衰退威胁的背景下,耶伦建议亚洲经济体采取三大措施扩大内需,首先增加在教育、医疗、退休金方面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刺激消费增长。

其次,将政府扶植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因为服务业与进出口贸易无关,能带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驱动。第三,加大对最贫困地区研发投入,她也提到中国最近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

耶伦还希望亚洲各国升值本币汇率以刺激全球需求,她说:“在提高亚洲经济体对全球需求的贡献上,汇率调整将起到核心作用。”

耶伦试图从两方面说服亚洲经济体升值汇率:这能够增加对外国产品需求,在不增加通胀压力的情况下促进内需增长;提高汇率政策弹性,能够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使货币政策更容易对国内问题做出反应。

在欧元崩溃的阴霾下,亚洲金融市场也难逃池鱼之殃,11月29日上证指数就深跌3.27%。继瑞银和花旗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之后,28日高盛也收回了看多中国股市的观点。

针对“中国崩溃论”最近卷土重来的迹象,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预测中国未来20年将持续8%的GDP增速。

林毅夫说,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仅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台湾地区。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

他因此相信中国能够继续高速增长20年,届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一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产值将达到美国的2倍。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文/李关云)

人民币遭遇看空 11月已贬0.5%

欧债危机加剧正在继续改变国际资金流向,“人民币只涨不跌”的市场一致预期也随之发生变化。

《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公开数据计算得出,截至11月25日,按当日1美元兑6.3554元人民币的中间价计算,11月以来人民币实际贬值0.5%。与此同时,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DF也显示,未来1个月到2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低,显示远期市场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

现在,对人民币升值前景的判断出现和以往不一样的声音。《华尔街日报》11月25日在显要位置刊发题为《人民币升值过程或将戛然而止》的署名文章,分析师称,中国10多年来才出现第二次外汇净流出,这或许意味着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日子即将结束。

文章援引东方汇理分析师科瓦尔奇克的话说,人民币升值很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升值压力已

经没有过去那么大。

科瓦尔奇克所说的“第二次外汇净流出”指的是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数据。据央行初步统计,10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总额比9月末净减少248.92亿元,自2008年1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资金流出的结果就是,2010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以每年5.5%的速度升值的过程行将结束。相对地,人民币升值的波动性可能会升高,从而令下注人民币升值的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加大。”科瓦尔奇克说。

而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称,2012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可能仅为3.3%,低于今年4.5%的升值预期。

市场主体的行为也反映出人民币升值预期或有改变。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2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0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仅32亿美元,创下该数据按月公布以来的新低。具体而言,10月的代客售汇数据与8月和9月持平,但代客结汇数据却明显下滑,这成为结售汇顺差创

下新低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若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企业和个人倾向将外汇卖给银行,即银行结汇;而当市场预期人民币贬值时,企业和个人则愿意手持美元,从银行买入外汇,即银行售汇。由此看出,结汇下滑表明市场主体不再一致看多人民币。

而作为资金流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显示,10月出口增速延续低迷之势,当月贸易顺差170.33亿美元,远低于市场预期。在贸易顺差下降的趋势下,人民币升值步伐放缓在情理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日前在微博中表示:

“从市场情绪、贸易收支、国际资金流动等几方面观察,我以为人民币升值势头已经基本结束,至少阶段性见顶。从我国明年外贸形势、欧债危机诱发资金外流、国内房地产调控导致资产价格普遍开始回落等多方判断,也应该立即停止单边升值。”

路透社近日援引巴克莱资本最



新报告指出,“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包括允许更大范围的双向汇率波动;更多地使用货币篮子,允许兑美元的即期汇率更大的波动范围)可能不久就会形成,这可为双向货币波动铺平道路。

路透社报道称,随着外部盈余的缩小和资本流入的放缓,人民币已不再被明显低估。过去两个星期,市场即期汇率曾多次被交易到交易区间较弱的一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巴克莱资本预期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

人民币年均升值5%至10%,但也表示,在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下,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利变化可能诱发多次的货币贬值。

不过,在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看来,人民币仍将保持升值态势。首先,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格局仍将维持;其次,人民币目前仍被低估,距离均衡汇率还有一定距离;第三,目前热钱比较“安静”,有利于人民币实现均衡汇率。

(摘自《经济参考报》文/张莫)

6000家企业样本调查:企业经营环境倒退至08年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是更好还是更坏?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7个方面,除了“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两项的评价比2008年略有好转外,企业对“人力资源供应”、“金融服务”、“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政府行政管理”、“基础设施条件”5个项目的主观评价均低于2008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的评分中,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分别占到被调查企业总数的49%、41%以上。

樊纲表示,减少对地方的微观干预,改善政府和市场关系,改善政府和企业关系,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上述会议也呼吁,下一阶段国家要尽快打破垄断,推动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其他服务业领域,并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包括OTC市场),为小企业融资服务提供支持。

根据樊纲发布的上述调研成果,2010年与2008年相比,中国企业在经营环境的7类分项中有5项出现倒退。在2010年企业经营环境评价中,得分倒退最多的是“基础设施条件”,得分为3.19,而2008年的得分为3.57。分差居次席的是“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2010年的得分为3.1,2008年为3.24。此外,“人力资源供应”、“金融服务”、“政府行政管理”的得分也有小幅下降。

反观2008年,前述企业经营环境的7个项目得分均比2006年明显拔高,这显示从2006年到2008年,企业的经营环境改善明显。但是到了2010年却出现相当程度的倒退。

樊纲指出,2008年之前金融服务等方面都是有所改善的,企业的主观评价在2010年出现下降,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此外,2010年的被调查的企业中,90%是中小企业。

企业经营环境倒退

根据樊纲发布的上述调研成果,2010年与2008年相比,中国企业在经营环境的7类分项中有5项出现倒退。在2010年企业经营环境评价中,得分倒退最多的是“基础设施条件”,得分为3.19,而2008年的得分为3.57。分差居次席的是“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2010年的得分为3.1,2008年为3.24。此外,“人力资源供应”、“金融服务”、“政府行政管理”的得分也有小幅下降。

樊纲建议,国家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就需要在政策上松绑,地方政府也应该进行思考,“我们如何在各个方面改善,改革我们的制度,调整我们的政策,清理我们的各种政策,减少对地方微观干预,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

改善各复杂制度环境,使我们企业做得更好。”

调研报告不仅进行了纵向对比,也对各个省份的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横向对比。2006年、2008年和2010年的数据显示,经营环境评价靠前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其中上海市一直稳坐第一把交椅。

2010年的前五名分别为上海、江苏、天津、浙江、北京。而中西部地区除了重庆有大幅度提升外(2010年排名第11名,2008年第17名,2006年第20名),大多省份排名比较靠后,且进步不明显。

樊纲建议,国家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就需要在政策上松绑,地方政府也应该进行思考,“我们如何在各个方面改善,改革我们的制度,调整我们的政策,清理我们的各种政策,减少对地方微观干预,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

改善各复杂制度环境,使我们企业做得更好。”

而政府能否放开管制,让中小企业尽快得到发展,将关系到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能否快速提升。

根据统计,目前中国内地有50多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这些企业相对集中在垄断型、基础性产业,大部分是央企。刘世锦指出,这与巴西、墨西哥等

国类似。这些国家因为垄断行业没有开放,私营和中小企业经济没有很好发展,导致人均GDP无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人均GDP得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得益于其民营企业的壮大。

因此,刘世锦建议,下一步需要放宽准入,鼓励产业竞争,推动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特别是对基础行业和服务业放宽准入和鼓励竞争,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重点,并且力争在比较早的时间内能够取得比较实质的进展。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则认为,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投资,主要依赖政府和银行资金,走的仍是融资平台的路子,这很容易形成坏账。为此,需要积极推动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中小型企业融资服务。

(摘自《21世纪网》)